

官渡之战新探

杨德炳

(武汉大学 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官渡之战是汉末三国三大战役中的头一个战役,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之战,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从战前准备层面看,曹操早在初平二年七月就认定与袁绍的决战不可避免,在军事、政治、经济、人才等方面处心积虑地为日后的这场决战作了精心的全方位的准备。袁绍在很长一段时期根本没有意识到曹操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对手,准备既不充分又有严重缺失,部队战斗力不强,且领导集团对要不要发动这场战争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从战略部署层面看,曹操亦比袁绍合理。从战役过程层面看,双方在谋略、指挥和战斗力等方面更不可同日而语。

关键词:官渡之战;曹操;袁绍;三国

中图分类号:K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11)06-0012-11

建安三年(198年)冬,曹操灭吕布,基本控制了河南地区。四年春,袁绍灭公孙瓒,尽有河北之地。至此,袁绍曹操这两位昔日的朋友、同盟者,终于为争霸中原而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

一、战前准备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称: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很明显,自恃出身高贵此时又身为反卓联军盟主的袁绍在说这话时是充满自信甚至是咄咄逼人的。曹操的回答虽不卑不亢,但却有点答非所问,只是笼统地说了点大道理而回避具体问题。或者此时他已有打算但不便明言;或者此时他真的无具体打算。曹操和袁绍是少年之交,在反宦官斗争中和讨伐董卓的战争中都是同盟者,特别是在州郡割据,群雄混战初期二袁争霸的大格局中,曹操仍是袁绍重要的同盟者与支持者。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的矛盾终将暴露出来。《三国志·武帝纪》称初平二年(191年)春正月,袁绍与冀州牧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就公开表示反对。“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裴松之注引的《魏书》说得更详细:“太祖大笑曰:‘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踰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说此时曹操就已决心图谋诛灭袁绍似嫌过早,但此二事在曹操心中引起强烈不满是可以肯定的。是年七月,袁绍逼走韩馥,自领冀州牧,鲍信对曹操说:“今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祇以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按鲍信,泰山人,曹操始起兵,信与其弟即以兵应操,操与袁绍表信为破虏将军。“时绍众最盛,豪杰多向之。信独谓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1]《鲍勋传》及注引《魏书》鲍信之言其要有三:一是只有曹操才是“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的人物,袁绍只不过是又一个董卓。二是现在还不能和袁绍对抗。三是为曹操提出了“且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的战略决策。意即他袁绍在河北发展,我们就在河南发展,以待时变。曹操是否早有如此想法,史无明载,不便推测,重要的是曹操听后大加赞赏。在此后的几

年内,曹操一面巧妙利用与袁绍的同盟关系来实现占领河南这一战略目标,一面则处心积虑地为日后与袁绍进行决战作精心的准备。

曹操的准备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在军事方面,曹操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先后取得了东郡、兖州,并通过平定张邈、陈宫的叛乱,使兖州失而复得,从而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与此同时又将袁术逐至淮南,袁术最后病死淮南;通过三攻张绣,使其受到重创,从而缓解了来自西南方面的威胁。最后,曹操还消灭了不可一世的吕布,占领了徐州及青州的一部分。可以说曹操兼并河南地区的过程,就是他的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由于河南是四战之地,强敌环伺,故其战斗之艰苦惨烈,远非袁绍兼并河北可比。因此曹军受到的生死考验,战斗力的提高程度,都远远超过袁军。与袁绍相比,曹军起步晚,力量小,强敌多,但占领河南地区的时间却比袁军占领河北地区早几个月,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一块与河北大致相当的地盘,一支数量虽处劣势但素质和战斗力都高于对手的武装力量,这便是曹操为与袁绍决战所作的最主要的准备。

政治方面,曹操的政治声望与号召力本来远远不及袁绍,但他通过迎天子都许来了一个角色转变,一跃而变成天子重臣、朝廷依靠,动辄就“奉天子以令不臣”,从而在后来与袁绍的决战中能够打出保卫朝廷、保卫许都的正义旗号。

在经济上,曹操通过兴办屯田,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问题,不仅为农业生产的恢复找到了一种较好的模式,而且还解决了军粮的问题,从而为日后与袁绍决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此过程中,曹操还不拘一格先后招揽了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毛玠、钟繇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更可贵是雄才大略的曹操特别尊重人才,既知人善任,又能虚心接受这些人才的意见和建议,从而避免了许多失误;而这些人也敢于和乐于说出自己的见解。可以说经过几年的磨合,曹操与他们的关系是融洽的、和谐的。这些人才虽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正常的、团结的,看不出有什么地域、派系之争。战争是经济力、兵力和智力的全面对抗,曹操在军队数量、经济实力方面虽处劣势,但在智力和战斗力方面是优于袁绍的。

与曹操相比,袁绍的准备却不够充分。

在曹操取得兖州之前,袁绍和他的谋士们从未提及过曹操,可见他只把曹操看作自己的同盟者和支持者,还未意识到他会成为自己潜在的最大对手。嗣后曹操收编青州黄巾(初平三年十二月),逐袁术于淮南(初平四年春),两伐徐州(初平四年六月,兴平元年二月),实力迅速扩大;但此时袁绍也遇到了一系列麻烦,先是与公孙瓒大战于界桥和龙凑,接着又发生魏郡兵的叛变并与黑山军一道攻下邳城,故只能全力平叛,无暇顾及曹操。兴平元年(194年)四月,张邈、陈宫叛变,曹操陷入空前困境。这本是并吞曹操的绝好时机,可是由于公孙瓒此时已攻杀幽州牧刘虞,掌握了幽州的最高权力,成为袁绍的最大威胁,故袁绍不敢出兵进攻曹操,只是派使者说曹操使其“迁家居邳”,名曰“连和”,实为并吞。时曹操新失兖州,数战不利,军食又尽,将许之,赖谋士程昱力谏乃止^[1](程昱传)。因此袁绍不仅如意算盘落空,而且还暴露了自己的险恶用心。

兴平二年(195年)十月,沮授劝袁绍迎天子至邳城,绍不纳,而曹操却在建安元年(196年)八月迎天子都许。天子拜操大将军,封武平侯,并下诏书指责袁绍,绍一面上表为自己辩解,一面又对天子以己为太尉班在操下大为不满。怒曰“曹操当死者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操惧,请以绍为大将军,自己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建安二年(197年)春,曹操讨张绣,绣降而复反,重创曹操。袁绍致书曹操“其辞悖慢”,操大怒,举止失常,荀彧问之,操以绍书示彧,说我想讨伐袁绍而力量不够,怎么办?荀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深刻分析

曹、袁的优劣,以增加曹操的信心,但又冷静指出目下我们的任务还是先消灭吕布。曹操又说我担心袁绍西联关中,“南诱蜀汉”对我构成更大的包围。荀彧说关中将士以十数,莫能相一,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钟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1]《荀彧传》^①。操表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繇至长安,移书马腾、韩遂等,为陈祸福,腾、遂各遣子入侍^[1]《钟繇传》。从以上可以看出,袁绍采取的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因为他当时要全力对付公孙瓒,根本无力进攻曹操,却只图一时之快,致书侮辱曹操,除了激发曹操集团同仇敌忾之外,于自己并无任何益处。反观曹操集团,他们在冷静分析袁绍集团的情况后,不仅坚定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进而思考如何打破袁绍可能构建的更大的包围圈,并及时派遣钟繇去稳定关中形势。官渡之战最紧张的相持阶段,钟繇给曹军前线送来马二千余匹,从而有效支持了前线^[1]《钟繇传》。

更严重的是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正准备集中十万精兵、马万匹,大举进攻曹操之际,其领导集团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先是监军沮授认为近讨公孙瓒,出师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轻动。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谋主郭图、治中审配坚决反对,说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易如反掌。沮授又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而受攻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配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绍纳之。图等乘机谗毁沮授曰,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太盛,何以制之?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授只典一军,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2]《袁绍传》。我们在此暂不评论两种主张孰是孰非,只想指出袁绍只采纳一味迎合自己的郭图等人的意见,而对沮授的再三规谏和提醒不但不予理睬,反而听信谗言将其兵权削去三分之二,这就太不正常了。以后的事实证明,袁绍从此时起就不再听取沮授、田丰的任何意见和建议,而对郭图等人则是言听计从。身为统帅的袁绍的这种偏袒态度,使原本只是认识上的分歧扩大为意气之争甚至是派别之争,其结果只能削弱领导或将领导引入歧途,从而给嗣后的军事指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反观曹操阵营,当袁绍即将进攻时,“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供吾奉也。’”^[1]《武帝纪》。又大司农孔融问荀彧:“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荀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而擒也。”^[1]《荀彧传》可见曹操领导集团不仅是高度统一和团结的,对下级将领的畏敌情绪也不简单地采取责怪甚至惩处,而是耐心地向他们剖析袁绍的五大弱点,以坚其信心。观荀彧与孔融的对话,简直就像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了。这样作的结果,对统一认识稳定军心和加强凝聚力均大有好处。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军心的稳定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战前部署

曹军的战前部署,按正面、左翼、右翼三方面进行。由于曹军是守方,故兵力部署体现了战略防御的特点,那就是后发制人,即在最有利的战略位置集中优势兵力顶住敌军的强大攻势,然后制造和抓住机遇转入反攻。

曹军正面分为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黄河南岸诸渡口。但黄河渡口众多,不能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曹操只派于禁率步骑二千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至滑县以北的一段)、原武(今河南原阳)一带;派东郡太守刘延防御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此防线当然不可能阻挡袁军渡河,但能对袁军的渡河起到干扰、破坏作用;还能通过前哨战起到挫其锐气,试探敌军战斗力的作用。第二道防线设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这是曹操抗击袁军的主要防线。官渡地处曹占区中部稍前,地多沙丘,前有天然障碍官渡水;东为

^① 按荀彧所云之“蜀汉”,非指刘备所建之蜀汉政权,而是指益州牧刘璋所治的巴蜀地区和荆州牧刘表所治的江汉地区。

官渡水与阴沟水的交汇处,该处堤多,流缓河宽,积泥数尺,葭苇茂密,行船徒步,诸多不便;西南为圃田泽,是水网地区,东西四十里许,南北二百里许,其内有二十四浦,浦水盛大时,溢流北注。官渡地处上述两大障碍地带之间,成为袁军进攻途中唯一可行的喇叭口,因此,曹操选定这一有利地形扼守是极其高明的。因为它能弥补曹军兵少的不足,增加了阻挡敌军南下,打破敌军进攻的胜算。因此,官渡防线是曹操的生命线,能否守住实关系到曹操的生死存亡,故由曹操亲自率领大将张辽、乐进、于禁、徐晃、曹洪,谋士荀攸、贾诩、郭嘉等人镇住之。第三道防线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设在许都,由侍中兼中书令荀彧镇守,荀彧还负责后方诸事务。但此防线在此战役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稳定后方,防止反曹势力乘机作乱以及供应官渡前线等方面。如果官渡不保,曹操主力被歼,许昌是保不住的。

左翼防线:首先是利用袁绍与公孙瓒酣战之机,于建安四年北渡黄河占领河内,命魏种为太守,用以阻止袁绍并州军的南下,并威胁袁绍大后方的右侧。以建威将军夏侯惇防守敖仓和孟津(今河南孟县),以保左翼安全。以蔡阳屯驻叶县,以防止汝南黄巾刘辟、龚都军为乱。以李通屯汝南以防孙策。右翼防线:命琅邪相臧霸率军入青州攻下齐(今山东临淄一带)和北海(今山东寿光一带)以牵制袁军东下。命刘备与朱灵去徐州阻击袁术北上防止二袁合流^[3]。命程昱守鄄城,时昱有兵七百人,操欲益兵二千人,昱以为兵少敌必轻易不来攻。后绍果不来攻,昱遂收山泽亡命,得精兵数千人^[1]《程昱传》。

相比之下,袁绍的部署则比较简单,即集中优势兵力取道黎阳、白马、延津,决战官渡,最后攻取许都。其理由是袁绍拥有巨大兵力优势,又处外线作战有利态势,如果兵分几路,从几个战略方向实行分兵合击,就可能使曹操的劣势兵力难以应付^{[3]381-382}。我们同意这一见解。当然,袁绍还是作了一些相关部署的,如派人联络张绣和刘表,争取造成南北夹击之势,但均未成功。《三国志·贾诩传》称:建安四年(199年)九月,“绍遣人招绣,并与诩书结援。绣欲许之,诩显于绣坐上谓绍使曰:‘归谢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绣惊惧曰:‘何至于此?’窃谓诩曰:‘若此,当何归?’诩曰:‘不如从曹公。’绣曰:‘袁强曹弱,又与曹为仇,从之如何?’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十一月,绣率众降操,拜扬武将军,官渡之战,绣力战有攻;表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1]《张绣传》,《贾诩传》。袁绍此举,不但没有招徕张绣,反而为张绣降操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既彻底解除了曹操的肘腋之患,又为曹操添了一员猛将,一位顶尖级谋士。与此同时,袁绍又遣使求助盟友荆州牧刘表,“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1]《刘表传》。至此,袁绍南北夹击曹操的计划全部落空,遭此挫折,他对此类计划也不甚热衷了。

有意思的是,曹操对左右翼的防御作了周密部署,而袁绍却并未分兵从左右翼发动进攻;当然这不能说明曹操的部署是多余的。不过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连老谋深算的曹操也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刘备的叛变;而此事极有可能使曹操处于南北夹击的危境之中。原来刘备被吕布击败后,走归曹操,操遇之甚厚,表为豫州牧。备助曹操消灭吕布后,操礼之愈重,表备左将军。但曹操并不真正信任刘备,刘备更是秘密参加了董承等人的反操密谋。建安四年夏,袁术途穷,谋求北奔,曹操为阻止二袁合流,派刘备与将军朱灵前往徐州阻击。曹操的谋士程昱、郭嘉、董昭都认为此举不妥,操亦后悔,追之,不及。刘备果于十二月杀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反操,郡县多应之,众至数万人,并遣使与袁绍联合。曹操派刘岱、王忠前往击备,兵败而回。建安五年正月,曹操决定亲自讨伐刘备,诸将以为“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操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1]《武帝纪》遂东击刘备,破之,备奔袁绍。曹操虽未料到刘备的反叛,然刘备一旦反叛,他便力排众议,亲率大军击败刘备,平定徐州,从而避免了被袁绍、刘备内外夹击危机局面的出现。当曹操东征刘备时,“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1]《袁绍传》关于这个问题王夫之曾有过一番议论,大意是:袁绍以子疾为由不纳田丰之计,当另有原因。因为绍虽年老智衰,还不至于因婴儿疾病而坐失大计,再说自己不去,命一大将前往又有何不可?真正的原因一是怕自己出兵,“操军必惊骇溃归”,徒使刘备乘机诛杀曹操入许拥帝,而与自己争权。二是刘备抢在袁绍行动之前举事,亦是怕操为绍所擒,就算自己“拥天子之空质”,仍然要受到强大嚣张的袁绍威逼。“惟先绍而举,则大功

自己以建,而绍之威不张”^[4]卷九献帝二十一节。我们认为王夫之的议论是难于成立的。第一,他的这些看法纯属主观臆测,并无史实依据。第二,他的一些提法显与史实相违。如说刘备抢先举事,是怕袁绍先消灭曹操,自己即使拥有天子,还要受袁绍的威胁。事实真象是当曹操派刘备东击袁术时,他的谋士们就认为大不妥;操亦后悔,并派人去追赶,不及;后又派刘岱、王忠率兵击之,不克;再加上董承等人密谋败露皆夷三族;可见刘备的起事,不是有意抢在袁绍之前,而是为情势所迫有意抢在曹操大军到来之前以争取主动。第三是他的一些看法于情理亦难说通。如说袁绍怕自己先出兵会引起操军溃败,反被刘备诛操入许,真是奇怪之极。因为袁绍兵力大大强过曹操,刘备则远不如曹操,故曹操征备之时袁绍乘机袭操,那么大获全胜的一定是袁绍,怎么会是刘备呢?再说在王夫之笔下,曹操简直不堪一击,好像刘备、袁绍谁都担心对方先消灭了曹操似的。其实刘备非但不是害怕袁绍先出兵,而是生怕袁绍不出兵,故决然起事,并派人联络袁绍,以促使其出兵与自己夹击曹操。最后让我们看看当时人对此是如何说的。上引《袁绍传》称,田丰劝绍袭操后,绍“辞以子疾,不许”,田丰以杖击地说,这样好的机会,竟因婴儿生病而丢弃了,可惜啊!二者是互相印证的,前者是主证,后者是旁证,没有史实依据,不好轻易否定。上引《武帝纪》称曹操料定袁绍不会出兵的理由是“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的说法则是“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1]《郭嘉传》注引《傅子》。他们的话连起来看就是袁绍见事迟,性子慢而且多疑,故不会出兵,即使出兵也不会很快。我们认为以上二人特别是曹操,以他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和人生阅历,以他对袁绍的熟悉,他的判断应该是可信的。因此我们认为袁绍没有出兵的主要原因是他见事迟,性子慢而多疑;既然如此再加上孩子生病,他就以此为由拒绝了田丰的建议。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辨明此事,是因为此事说明在突然出现的重大事情面前,曹操即使认识上有失误,一经谋士提醒,就能很快纠正,而且雷厉风行付诸行动,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袁绍不仅见事迟,生性多疑,而且往往自以为是拒不接受正确意见,终于坐失良机。类似的事情在嗣后的战事中还不断重演,故此事可视为官渡之战曹胜袁败的一个预兆。

三、战役过程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曹操击败刘备,备奔袁绍,操还军官渡。这时袁绍又议攻许,田丰认为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恳谏,绍怒甚,以为沮众,械系之^[1]《袁绍传》。二月,绍进军黎阳,沮授临行,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众实疲敝,而将骄主怙,军之破败,在此举也。”^[1]《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沮授的这些言论,当然会加深袁绍对他的不满。以上两事说明,直到渡河前夕,袁军最高领导层对眼下是否应该发动这场战争仍存在严重分歧。田丰、沮授执着地坚持己见,结果田丰被戴上刑具关了起来,沮授则从此不再被信任。这种情势必会给嗣后的军事行动带来严重后果。

官渡之战的具体过程,史载颇详,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初战阶段

斩颜良诛文丑,大挫袁军锐气。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大军进至黄河北岸的黎阳,就此拉开官渡之战的帷幕。袁绍首先令其大将颜良为先锋,渡过黄河进攻曹操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沮授提醒说,颜良性格狭隘急躁,虽然骁勇,不可独当此任。袁绍不听。四月,曹操北救刘延,谋士荀攸献计说,敌多我少,只有分散敌军兵力才能取胜。可作出渡河袭击敌后的样子,袁军势必分兵应之,这时我军突然奔袭白马,攻敌不备,颜良可擒。操从之。袁绍闻曹军欲渡河,果分兵应之。曹操乃引兵直奔白马,距离十余里时,颜良才发现,大惊失色,慌忙应战。操令张辽、关羽为先锋出击,“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1]《关羽传》。

曹操带领白马军民辎重沿河西撤,袁绍欲渡河追击。沮授又谏曰:初战胜负引起的变化,不可不察。为今之计宜将大军留屯延津,只派部分精兵去进攻官渡,如果进展顺利,再迎大军也不为晚。如果全军现

在就进攻官渡,万一失利,就难于返回了。袁绍仍不予采纳。“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辞。绍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属郭图。”^[1]《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至此,沮授已被完全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袁绍大军渡过黄河,在延津以南驻扎,派大将文丑与刘备追击曹操。操勒兵驻营南山坡下,派哨兵登垒瞭望。哨兵报告敌来了五六百骑。一会儿又报告敌骑越来越多,步兵多得数不清。曹操说不用再报告了,下令骑士解鞍放马。这时从白马带来的辎重都散在大路上,诸将以为不如还营坚守。谋士荀攸说,这正是诱敌之计,岂可撤退!曹操望着荀攸,发出会心微笑。这时文丑、刘备率五六千骑兵追到,众将说现在可以出击了吧?曹操说还未到时机。这时敌骑越来越多,部分敌骑开始抢夺辎重,阵势混乱。曹操这才下令出击,六百铁骑突然冲出,大破袁军,阵斩文丑。曹军白马解围,延津突袭,大败袁绍先头部队,阵斩河北名将颜良、文丑,大挫敌军锐气,使其被迫放慢推进速度。曹军大受鼓舞,移师官渡,严阵以待。白马、延津二战可以说是袁、曹双方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斗力优劣高下的试金石。无论从作战过程还是作战结果看,双方的优劣高下都充分地显示出来了^①。七月,袁军推进到官渡水北的阳武(今河南原阳),沮授又说绍曰:“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1]《袁绍传》绍又不从。可见袁绍连吃两场败仗,仍不从中吸取教训,拒不承认曹军战斗力高于自己这一铁的事实,看来河北将士的血算是白流了。

2. 官渡相持

建安五年八月,袁绍大军推进至官渡前沿,依沙丘为屯营,东西达数十里。曹军亦分筑营垒,与之对峙。九月一日,曹军出营与绍军合战,不利,还营坚守。谋士许攸说绍曰“公无与操相攻也。急分诸军持之,而径从他道迎天子,则事立济矣!”绍不从,曰“吾要当先围取之。”^[1]《武帝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袁绍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就是要从正面进攻消灭曹操!简直就是赌气话,故许攸听后心里也很生气。于是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袁军起高橰(露顶无盖的楼),筑土山,居高临下,俯射曹营,曹营士兵只得蒙楯而行,十分恐惧。操乃作发石车以击敌楼,皆破之,因声如巨雷,故袁军号为“霹雳车”。袁军挖地道,偷袭曹营,曹军则挖沟壕以拒之。袁军虽然不能攻下官渡,但曹军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兵少粮尽,士卒疲乏。史称曹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1]《武帝纪》,其实不止此数^[5],但与袁绍十万大军相比,当然仍处绝对劣势,故与袁绍大军在长达数十里的战场上长期对抗,其疲敝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军粮又快告尽。二是百姓困于征赋,民心不稳,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叛乱。好在曹操及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才有所缓解。三是敌人的策反和敌军对后方的侵扰。如汝南黄巾刘辟等乘袁曹官渡相持之际叛曹应袁,袁绍派刘备率军与刘辟一起侵扰汝、颍间,自许以南,吏民不安,多举众而应之。曹操派曹仁击败刘备,收复叛县。袁绍又遣别将韩荀抄断官渡以西通道,曹仁击破韩荀于鸡洛山(今河南密县东北)^[1]《曹仁传》。袁绍此后虽不敢分兵南下,但刘备的势力仍然在汝南。更严重的是官渡前线最吃紧的时候,也就是袁绍策反最活跃的时候,致使京城许都和军中的许多官员和将领都致书袁绍,暗通消息,为投降作准备。这一系列危机、困难接踵而至,压得曹操焦头烂额,心力交瘁,难于坚持下去,一度考虑从官渡后撤,退守许都,于是致书荀彧,“议欲还许”。关于此事,《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是:

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公从之。

《三国志·荀彧传》的记载是:

(操)书与彧,议欲还许以引绍。彧曰“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

^① 初战阶段过去只讲白马、延津之役,那是因为斩颜良、诛文丑太有名了。其实曹操真正的“先登”部队于禁部的两次击破袁绍别营所取得的胜利也是相当可观的。《三国志·于禁传》称“太祖初征袁绍,绍兵盛,禁愿为先登。太祖壮之,乃遣步卒二千人,使禁将,守延津以拒绍。……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击绍别营,从延津西南缘河至汲,获嘉二县,焚烧保聚三十余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余人。太祖复使禁别将屯原武,击绍别营于杜氏津,破之。迁裨将军,后从还官渡。”

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太祖乃住。

《三国志·贾诩传》的记载是:

袁绍围太祖于官渡,太祖粮方尽,问诩计焉出,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太祖曰:“善!”

同一事情《武帝纪》中荀彧的回答主要指出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是天下大势走向何处的最大关键,你曹操一定能够战胜袁绍。《荀彧传》本传中荀彧的回答,首先以历史上楚汉相争为例,那时刘邦、项羽处境都很困难,但谁都不先退却,因为谁先退却谁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一败涂地。其次指出你以小抗大,坚持到现在,袁军的虚实已现,兵势已竭,局势必将发生变化,这正是你抓住契机,出奇制胜的时候。贾诩的回答是你在智、勇、用人、决机四方面皆胜过袁绍,至今还未战胜袁绍,是因为你太四平八稳了。如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机遇放手一搏,胜利顷刻可至。值得庆幸的是曹操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打消了后撤念头,决心坚持下去,待机决胜。多年之后,曹操在上表为彧请功时说:“昔袁绍侵入郊甸,战于官渡,时兵少粮尽,图欲还许,书与彧议,彧不听臣。建宜住之便,恢进讨之规,更起臣心,易其愚虑,遂摧大逆,覆取其众。此或覩胜败之机,略不世出也。”^[1]《荀彧传》注引《彧别传》对荀彧的钦佩与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3. 奇袭乌巢 全歼袁军

曹操既决定坚守待机,首先就要解决军粮问题以稳定军心。为此他亲自抚慰运粮官兵说,再坚持半月。保证为他们消灭袁军,那时就不再辛苦你们了。这时荀彧报告说,有一支袁绍的运粮车队即将到达,其将领韩猛勇锐而轻敌,击之可破。曹操即命大将徐晃与史涣前去截击。二将在故市(今河南荥阳东北)击破韩猛,焚其粮车数千辆^[1]《荀彧传》,《徐晃传》。袁绍见粮车被焚,又令其大将淳于琼率兵万余护送一支更大的运粮车队于十月到达前线,屯驻于离官渡北四十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以西七公里)。沮授鉴于不久前韩猛车队被焚,建议袁绍派蒋奇率领一支部队赴乌巢,外围加强保护,以防曹军偷袭,不料袁绍又是不听!此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因贪财得不到满足,献计又不被理睬,特别是家人犯法又被审配关押,怨怒难忍,叛袁归曹。许攸是袁绍由洛阳带到冀州的资深谋士,又是曹操的老相识,故曹操料定他的到来一定会给自己带来极其重要的信息,不禁喜出望外。《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称:

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大喜,乃举精锐步骑,皆用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谷宝货,斩督将眭元进,骑督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首,割得将军淳于仲简鼻,未死;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怛惧。

同书《武帝纪》称:

绍谋臣许攸……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彧、贾诩劝公(信之)。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

以上二则生动清晰地描述了曹操从定计、夜奔到全歼乌巢守敌,焚毁敌军粮的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一是曹操从许攸口中得知袁军屯粮乌巢这一信息后,认为这就是荀彧、贾诩所指出的大好机遇,于是当机立断,亲自率领五千步骑夜袭乌巢。这是果于决机。二是曹操令部队冒用袁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遇敌盘问就谎称奉袁绍令支持后方部队防止曹操偷袭。这是善于用智。三是进攻乌巢时,袁绍援军亦至,左右请分兵敌之,操拒不分兵,集中力量猛攻乌巢守军,终于大获全胜。这是勇于决胜,打得准,打得狠。这

场充分体现了曹操作战风格的奇袭战,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范例。

反观袁绍阵营,情况正好相反。《后汉书》卷七十四上《袁绍传》称:

绍闻操击琼,谓长子谭曰“就曹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高览、张郃等攻操营,不下。二将闻琼等败,遂奔操。于是绍军惊扰,大溃。

《三国志·张郃传》称:

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图惭,又更谮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

以上记载,要点有三:一、袁绍的决策是曹操攻我乌巢,我就攻他大营。就算他毁了我的军粮,我破他大营,他就无家可归了。二、张郃认为曹操兵精,去必破琼,当前最重要的是救淳于琼。曹营巩固,难于攻破。如淳于琼等被擒,我们也尽为俘虏了。郭图附和袁绍说我军攻操大营,操必还军自救,则乌巢之危自解。袁绍决定只派轻骑救琼,而令张郃等率重兵攻操大营。三、这样作的结果曹操攻破乌巢,焚其粮食,而袁军攻不下曹操大营。加之郭图为掩己非诬称张郃幸灾乐祸。张郃又气又怕,投降曹操。

我们认为袁绍的决策从兵法上看似不为错,而且他往年也有过这样的成功战例;但从目下的情况看就大错特错了。初平四年(193年)正当袁绍与公孙瓒在外作战时,后方魏郡兵与黑山军发动叛乱,占领了邺城。袁绍不是去攻打邺城,而是围剿黑山军的老窝,不仅迫使叛军放弃邺城,而且重创了黑山军。但今非昔比,如今面对的曹操是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其谋略指挥之高超,其部队战斗力之强大,都远远超过昔日叛军的乌合之众。这一点身处一线指挥作战的张郃自然早有切身体会,故他认定以重兵援乌巢,力保军粮不失^①。可惜袁绍一直顽固地拒不承认这一基本实情,再加上郭图的阿谀逢迎,他还真以为自己可以故智重演,稳操胜券了呢!又曹操奇袭乌巢,袁绍攻操大营,看来都是一种冒险,但曹操的冒险是合理的。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曹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又由于乌巢兵营只是临时性屯粮之地,无坚固壁垒可守,故集中精锐攻其不备,完全有攻破的可能。而袁绍的冒险则是不合理的,因为以他当时的力量完全可以作另一种选择,即采纳张郃之计,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救援乌巢。果如此,则不仅可能保住乌巢,甚至可能将曹操的五千人马一举歼灭!可惜他偏偏选择了以放弃乌巢为代价而妄图一举攻下曹营的昏招。结果乌巢守军被歼,军粮被焚,而曹操大营不但未被打破,反而连攻营的张郃都投降了曹操,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最后谈谈袁军何时溃败的问题。上引《张郃传》云“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郭图谮郃,郃惧,乃降曹操。裴松之在此条下议论说:据《武帝纪》和《袁绍传》记载,则是张郃投降曹操后,“绍众大溃”,“是则缘合等降而后绍军坏也”。因而有学者认为《张郃传》的记载不真实,是张郃家传自掩其丑,故与《武纪》、《绍传》互异,即是说,袁绍官渡最后失败,是由于张郃的降操,家传中有意回避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应当把这两种记载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上文说过,袁绍的军粮九月才被曹操焚毁过一次,有数千车之多。此次淳于琼万余士兵被歼,新运来的万余车军粮又被付之一炬;加上曹军又取所杀千余袁军的鼻子及牛马唇舌用来恫吓袁军,自然会引起袁军的极度惊恐与慌乱。因此说此时已开始引起崩溃其实也不为过,甚至张郃的降操本身也可以看成是这种崩溃的表现。当然张郃此举终于导致了袁军的更大崩溃。故陈寿编撰《三国志》时,于《张郃传》只云“绍军溃”,在《武纪》、《绍传》中则云“绍众大溃”,用字遣词是很有分寸的,不宜将陈志《张郃传》与“张郃家传”等同视之。总之,乌巢之役是整个官渡之战的转折点,张郃的投降,曹军的全面反攻,袁军的崩溃与被歼都只是它的连锁反应,或者说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没有乌巢之役,何来张郃之降,何来曹军的全面反攻,何来袁军的覆灭!而这一切几乎都是在顷刻间完成的,诚如贾诩所言“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建安十二年,曹操在为荀彧请功的上书中提到荀彧劝自己不要从官渡退守许都。荀彧的建议“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2]《荀彧传》后两句话的意思是奇袭乌巢,焚其军

^① 按张郃既参加过昔日的平叛作战,又是官渡前线袁军的重要将领,故对魏郡叛军与当前曹军的战斗力有着深切的了解与体会。

粮终于消灭了袁军。可见曹操本人也是把乌巢之役与袁军的败亡直接连在一起的。在曹军全面反击下,仅袁绍父子八百骑得以渡河逃生,余者悉被歼灭。至于他们是被斩杀或是投降后又被坑杀,史籍说法不一,疑点颇多,我们将另文专论,在此不赘。沮授被俘,曹操与授有旧,厚待之,劝授为己用。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曹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授后谋还河北,遂见杀^[1]《袁绍传》及裴注所引之《献帝传》。绍军既败,有人对田丰说“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1]《袁绍传》。沮授虽死于曹操之手,但他是在用一己之命换全家人之命。袁绍直到此时,仍不痛改前非,反而恼羞成怒,对田丰痛下毒手。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战败,不该彻底灭亡吗?

四、胜败有凭

官渡之战是汉末三国三大战役中的头一个战役,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之战,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关于此战中曹胜袁败的原因,人们已多有论述。下面我们试从战前准备、战略部署和战役过程三个层面来谈谈自己的浅见。

从战前准备层面看,曹操早在初平二年七月决定“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之时,就认定与袁绍的决战不可避免。因为袁绍早已明确表示一旦占据河北,就会迫不及待“南向以争天下”。因此,曹操在兼并河南地区的过程中,一面巧妙利用与袁绍的同盟关系为自己服务,一面处心积虑地为日后的这场决战作精心的全方位的准备。在军事方面,曹操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不仅打出了一块比河北小不了多少的地盘,而且锻炼出一支数量虽不及袁军但素质和战斗力均大大强过袁军的武装力量。曹操起步晚,力量小,强敌多,但全据河南之地的时间竟比袁绍全据河北之地还要早几个月,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曹操最主要的准备。在政治上,曹操通过迎天子都许,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优势。虽然我们不能夸大其作用,如认为曹操的战争因此就是正义的战争,深得人民的拥护而袁绍则正好相反等等。但它对曹操稳定关中陇右局势,争取周边小割据武装的支持,甚至在袁绍集团某些人中引起种种疑虑等方面确能起到一定作用。在经济上,通过屯田方式恢复生产。虽然由于河南地区破坏太严重,此时的恢复还是很有限的,但毕竟为决战准备了一定的物资基础。最可喜的是曹操在此过程中不仅收揽了大批当时最优秀的人才,而且经过数年的磨合,统帅与谋士及谋士们之间业已建立起一种信任和团结的关系,从而使曹军在用智和设谋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与曹操相比,袁绍的准备既不充分又有严重缺失。首先他在很长一段时期根本没有意识到曹操会成为自己最大的对手。后来曹操力量迅速扩大,他虽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内心仍看不起曹操,总觉得自己比他强得多。这种自我膨胀的心态,使他顽固地拒绝在他看来是带有扬曹贬袁色彩的合理建议,从而给他的决策接二连三带来失误。其次袁绍兼并河北,冀州牧韩馥拱手奉送;幽州的公孙瓒虽手握强兵,但后期只防守不反击,袁绍进行的完全是一场没有任何风险的瓮中捉鳖似的战争;只有界桥之战与平叛之战是经过艰苦激战才取得胜利的,但此战中那支战功赫赫由曲义指挥的骑兵旋即背叛袁绍,曲义亦被除掉。故袁军的指挥能力、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受到的锻炼和提高均远比曹军逊色。最后,也是最严重的,是领导集团在要不要发动这场战争上发生严重分歧。上述沮授与郭图、审配的争论可谓针锋相对,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献帝建安四年(199年)春:

沮授:

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弊,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

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

曹操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而受攻者也。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

郭图 审配:

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易如覆手。

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将士思奋,不及时以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监军之计在于持牢,而非见时知机之变也。

客观地讲,沮授的谋划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他对袁曹双方的估量,显然触犯了袁绍心中大忌,而郭图等一味投其所好,故袁绍不但不采纳沮授之议,而且从此时起对沮授、田丰等人不断施以打压。这样就使本属认识上的分歧,不仅没得到合理的统一,反而扩大为意气 and 派别之争,终于给日后的决战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从战略部署层面看,曹操亦比袁绍合理。曹军总部署是以中央正面防线为重点,兼顾左右两翼,而在正面的前沿、官渡、许都三道防线中,又以官渡为重中之重。曹操选择官渡这个最有利的地形,亲临前线坐镇指挥,集中了除荀彧以外的著名谋士,除夏侯惇以外的所有名将,集中了数万军队中的近两万精兵与袁军决战^①,是因为他确信非如此不足以阻挡优势袁军的强大攻势,而如果不能阻挡其攻势,后果将不堪设想。历史证明,曹操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反观袁绍的部署,他不是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兵力,分两路或三路向敌实行合击,使劣势之敌难于应付,而是集中全力进攻官渡,结果不但未能发挥其优势兵力的作用,反而被卡在官渡,由主动转入被动,这是他的最大失策。当然袁军也不是完全没有对曹军两翼采取过行动,如刘辟叛乱时,袁绍就派刘备率军前去策应;又如派别将韩荀去抄断曹军的粮道,但不是临时性的派遣,就是力量过小,故不堪一击,根本起不到分兵合击的作用。

从战役过程层面看,双方在谋略、指挥和战斗力等方面更不可同日而语。首先曹操将主战场设在官渡,就是企图利用这一特殊地形达到阻止、击溃、全歼袁军的目的。沮授看穿了这一企图,建议袁绍留部分兵力屯于延津作为后备队和接应力量,如前线顺利就全部压上去,当前线失利也好有个接应和退路,以免全军覆灭。袁绍不纳沮授之议,终于使沮授的担心变成事实。其次,纵观战役全过程,除第二阶段之初双方在官渡开阔地带“合战”曹军有一次失利之外,其余全是曹胜袁败。计有:白马之役斩颜良;延津之役诛文丑;于禁两破袁绍别营;曹仁击败刘备于汝颖间;曹仁击破韩荀于鸡洛山;徐晃、史涣击破韩猛于故市,焚绍军粮数千乘;曹操亲自率军袭破乌巢,焚绍粮车万余乘。我们从这六胜一败中还可以看出:颜良、文丑乃河北名将,淳于琼更是袁绍第一大将,甫一交手,便成刀下之鬼。延津之役,操骑不满六百而大败袁军六千骑;乌巢之役,操以五千步骑一举消灭淳于琼万余守兵(还不包括袁绍派来的援军)。六次胜利四次是从官渡前线抽调大军从袁军后方和自己后方实行奔袭,既能击破敌军,又能确保大营不失,真是攻如摧枯拉朽,守能安如泰山。这充分说明袁军的素质和战斗力与曹军相比真相差太大了。二、袁军的失败直接与袁绍的失误有关。如沮授早就指出颜良不可独任,袁绍不听,结果颜良被斩。沮授鉴于韩猛故市之失,建议袁绍派蒋奇率部加强对乌巢外围的保护,袁绍又不从,致有乌巢之败。最后,从指挥风格看,曹操果于决机,策得即行,勇于决战,打得准,打得狠,最突出的一是东征刘备,一是夜袭乌巢,前者避免了被袁绍刘备夹击的危运;后者直接导致了袁军的灭亡。而袁绍或反应迟钝,多疑寡断,坐失了与刘备夹击曹操大好时机;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终于断送了袁军最后一线生机。

总之,曹操在经济力、人力、兵力方面虽处于劣势,但经过数年精心准备,综合实力有所提升。到了官渡决战前夕,就综合实力而言,曹操只是相对弱势,而不是有所夸大的绝对弱势。这是曹操能够获胜的基础。而袁绍则由于准备不足且颇多缺失,造成部队战斗力不强,领导集团不和两大致命弱点,从而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曹操将主战场设在官渡,集中精兵强将与袁绍决战,其最终目的就是利用这一特殊地理条件消灭袁军。袁绍自恃兵多粮足,既不分兵合击,又不留后备队和接应力量,而是孤注一掷,坚持正面进攻;结果久攻不下,兵势衰竭,破绽现露,终于被曹操致命一击,血本无归。故曹操的正确部署是他获胜的关键,但若无袁绍的“配合”,只怕也难完全实现。

一个战役的胜败,一要看指挥,二要看部队的素质与战斗力。官渡之战中曹军的指挥与战斗力可以说均发挥到极致,这是它能以少胜多的根本保证。而袁军的决策指挥一错再错,部队作战一败再败,终于使

^① “数万”是个约数,一般认为是三万至四万。《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上)就认为曹军此时总兵力为三万余人,官渡前线的兵力为二万。

其兵多粮足的优势荡然无存,一败涂地。曹操本来就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统帅,陈寿对他的评价是“唯其明略最优也”,再加上有一群最优秀的智能之士辅佐他,他在用智设谋方面岂能不如虎添翼?故诸葛亮说到官渡之战时曾有如下名言“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1]《诸葛亮传》。真是千古的评价!当然曹操也不是没有失误,可贵的是此时的曹操一旦经人提醒,便能欣然接受,立即纠正,而纠正了失误的曹操顿时就会变成更厉害、更强大的曹操。袁绍也是一位不错的统帅,只是与曹操相比逊色多了。可他偏偏自视甚高,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里,特别是灭掉公孙瓒后,更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了。袁绍也有第一流的人才如沮授、田丰等,而且袁绍本来也是十分信任他们的,他们更是始终忠于袁绍的。但自从他们在谋划中对袁绍的急功冒进提出异议,对袁曹双方进行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估后,在袁绍看来这岂不是明目张胆抬高曹操,贬低自己,因此触犯了心头大忌,难于容忍,故而一律不予采纳,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一意孤行,决不悔改。袁军摊上了这样一位统帅,真是他们莫大的悲哀!

参考文献:

- [1]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 范晔.后汉书[M].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 [4]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杨德炳.官渡之战相持阶段曹军兵力考[J].襄樊学院学报,2008(10):24-27.

New Exploration on the Battle of Guandu

YANG De - bing

(Chinese Institute for 3—9 Century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China)

Abstract: The Battle of Guandu is the first battle of three battles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 the crucial battle for Cao Cao to unify the north areas , and the battle in which less and weaker defeat much and stronger in ancient time. Firstly , early in July , 191 , Cao Cao already firmly believed that a battle against Yuan Shao is unavoidable and he made all-around preparation including military matters , politics , economy , talents , etc. On the contrast , for a long time , Yuan Shao was not aware of the potential opponent , Cao Cao. So there is no preparation and better fighting capacity. What's worse , leadership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battle. Secondly , Cao Cao's strategic disposition is more advisable than Yuan Shao's. Thirdly , there is a long distance about strategies , directing , fighting capacity , et al. between Cao Cao and Yuan Shao.

Key words: The Battle of Guandu; Cao Cao; Yuan Shao; The Three Kingdoms

(责任编辑:陈道斌)